

为无指标户“筹措”建房补助,推动村里建起“老人之家” 这名“不谋私”的村支书 为何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指标户被克扣,无指标户拿到补助款

“克扣危房改造建房户补助资金1.7万元,却向无指标户发放了2.1万元。”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发现这起简单的克扣危房改造资金案却存在诸多蹊跷之处——5个指标户,3个没有克扣、1个全部克扣、1个部分克扣,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对待?

对此,张旺年解释说:“2015年,村里共有5个危房改造补助指标,但还有6个建房户没有申请到指标。因为他们都建了房,也都困难,开会讨论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要给无指标户也分一些,我同意了。但是又有人说如果每户补1-2千元有点少,我们就从之前村上征地的补偿款中补贴了4000元放在里面一起分配,就成了现在这个数目。”

2016年2月,芦淞区财政将补偿款足额拨付到5户有指标户存折上。随后,1个指标户将补助款取出后交到村上,1个指标户的补偿款由出纳取出,再连同村上补贴的4000元,当场按照每户3000元左右的标准发放给1个指标户和6个无指标户,6个无指标户共分配到2.1万元。

对于克扣标准“区别对待”一事,张旺年说,5个指标户,有3个是贫困户,确实非常困难,所以全额发放;1个是准五保户,建村部买的是他的地基,也给他在校旁建了可以安身的房屋,所以就没有分配给他;还有1户是普通建房户,和无指标户的情况类似,就只分给他一部分。

挪用生态公益林资金,“给村集体创收”

2014年至2015年期间,张旺年挪用本该“专款专用”的生态林补偿资金72925元,用于修村道、还欠款等村务开支。

“我们经过了村集体决策。我只想着村集体能有一笔收入,好为村民办更多的事。”张旺年说,自己之前一直认为,这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不算违纪。

“集体决策并不能成为违规违纪行为的‘挡箭牌’。”芦淞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评天下

尊崇英雄烈士 守护精神家园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的天空,英雄烈士灿若群星,熠熠生辉。

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英雄者,国之干。”尊崇英雄是人类一种最深沉的情感,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英雄是其历史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对英烈“污名化”的倾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人打着“反思历史”“范式转换”等旗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臆想代替史实,以枝节代替整体,种种光怪陆离的奇谈怪论,对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其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任由其泛滥,放任对英烈肆意攻击的言行,必然会消弭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态。殷鉴不远,从否定列宁、斯大林,到否定苏共历史、苏联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在当时的苏联大行其道,造谣中伤、贬损污蔑社会公认的英烈成为“时髦”,结果造成人心不古、思想混乱,成为亡党亡国的重要推手。历史的惨痛教训,反复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英雄不容亵渎,先烈不容诋毁!

让我们弘扬传承英烈精神和社会正气,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据人民日报)

□时事漫画



▲漫画/勾桦

一砖不剩

成都宽窄巷子是国内著名历史文化保护区。近日,记者来到成都市青羊区长顺上街入口处,看到几百米长的呼吸瓦墙,从墙面最底层一块砖开始,一直延续到两米多高;触手可及之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周边市民调侃:“一砖不剩”。

(据新京报)

让五保老人安度晚年,却让无资质者来承建

2016年3月,竹山村几名五保户向张旺年等反映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倒塌风险。张旺年和村委成员商量,村里干脆建个“老人之家”,集中安置14名五保户或残疾人,让他们安度晚年,后集体决定由具备多年建房经验但无资质的张某负责项目建设。2016年4月20日,竹山村与张某签订正式施工协议。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他们先后多次向区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资金,累计争取到69.6万元资金支持,村里也垫付了一大笔资金。

目前,该项目主体部分已基本完成,但尚未经政府相关部门验收。

不谋私利就可逾矩? 违纪就要受处理

“我自己没有私心,但是学识水平有限,法纪意识不强,违反了党的纪律,教训很深刻。”张旺年在接受审理谈话时,如此反省自己的错误。

芦淞区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在村(社区)一级,少数党组织负责人主体责任意识仍比较薄弱,认为只要“不谋私利”,一些“逾矩”的行为只是小节,张旺年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克扣危房补助款发放给无指标户,还觉得克扣与发放方式“合情合理、皆大欢喜”,实际上侵害了有指标户利益、违反了群众纪律;用“对策”对待“政策”,为了给村集体创收,挪用生态林公益金;有心办“好事”,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推进“好事”,却因为小节“失身”。他的行为违反了纪律,也受到了处分。

(记者 李卉 通讯员 芦纪宣)



过一个绿色的清明节

清明时节,春风吐绿,人们纷纷回乡扫墓祭祖,但一些地方攀比浪费、低俗演出、乱埋乱葬等不文明祭扫的现象反弹,给人们增添了许多额外负担,对生态环境和公序良俗造成了损害,还存在失火烧山等风险隐患。透视清明的节日意涵和当前种种不文明祭扫行为的消极影响,提倡过一个绿色的清明节非常必要。

清明,是一个清静、明静、疏朗的节气。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风盈怀,明月在心,这是清明节气的时序意涵,也是我们在春日里祭祀先人应有的心态。

不文明祭扫根源于一些陋习,必须摒弃。在一些地方,老人去世后儿女必须将其风光大葬,祭扫必须兴师动众,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儿女的孝顺。在这种陋习影响下,人们只好跟风祭扫,互相攀比之下,不文明祭扫的现象愈演愈烈。

不文明祭扫是积弊陋习,摒弃它的根本途径是移风易俗。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场深刻的绿色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应该更绿色。清明祭扫,不妨选择更加绿色、低碳、环保、文明的方式,如鲜花祭扫、植树祭扫、撰文祭奠等,这些都是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正确打开方式。

《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成。反之,如果满脑子私欲杂念,即便烧了一座金山,也不过是让先人墓前多了些烟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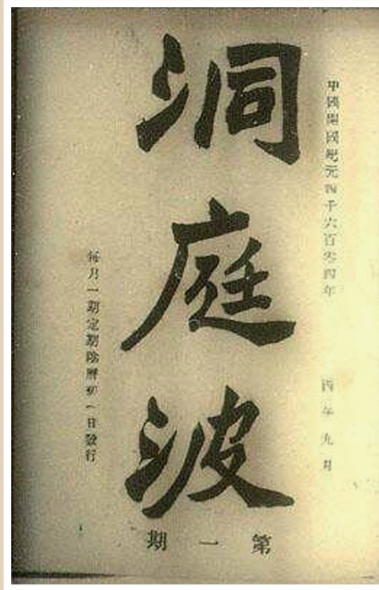
(据光明日报)

风光带

旧闻

2018年04月06日 星期五
责编:邱峰 美编:刘昭彤 校对:单红

近代“留日潮”中的那些醴陵学子



▲《洞庭波》第一期



▲王芑生



▲宁调元

掀起留日潮

辛亥革命前,地处内陆的湖南,兴起留日风潮,满怀热情的湘籍学子纷纷负笈东渡。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湖南者800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其中来自醴陵、长沙、新化籍的学生最多。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有详细资料记载的醴陵籍学生就达到了数十人。

究其原因,甲午战败带来的国耻和国辱,激起湖南士绅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意图仿日维新变法。

1903年新学制颁布后,自费留日学生年年增加。当时醴陵经济发展较好,为自费留日提供了经济基础。留日潮下,当地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很多都会让家中青年前往日本留学。

办报反封建专制

20世纪初,湖南大批留日学生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先后在日本创办刊物,激烈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丧权辱国的行径。

《洞庭波》为留日的醴陵籍学生傅熊湘和宁调元创办,后改名《汉帜》出版,其言论激烈,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通过秘密的渠道传入湖南时,人们争相传阅。醴陵市志(民国版)记录下了这一情景:“凡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

傅熊湘回国后,与胡适、丁洪海等编辑《兢业旬报》,宣传推翻帝制。1910年,他在苏州与张默君编辑江苏《大汉报》,1911年回到湖南,主编《长沙日报》,1916年因抨击北洋军阀,报馆被毁。

宁调元回国后则主编了《帝国日报》,1912年初在上海参加民社,创办《民声日报》,长期在报上“讨袁”。1913年8月,袁世凯下令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9月,宁调元以“内乱罪”被杀害于武昌抱冰堂,年仅30岁,后归葬醴陵西山。

办学校,兴实业

明治维新后,日本非常重视教育的全民普及,学生入学率一般在95%以上。湖南在日留学生更是指出:“日本学校之多如中国之洋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烟瘾者。”

受此影响,醴陵人文俊铎留学回国后,与熊希龄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于姜湾,招了学生数百人。不久,文俊铎又与宁调元等将涠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为涠江中学堂。

1906年,文俊铎又开办了速成师范学堂于明伦堂,招了一个班级的学生,这也成了醴陵师范教育的开端。1912年,文俊铎创办教员养成所,从全县私塾教师及在乡知识分子中选拔600人入学,一年后毕业分赴各地任教,让全县城乡小学增加200余所,让醴陵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此外,文俊铎与熊希龄还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聘请技师,引进部分技术设备。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

事实上,当年留学日本的醴陵籍学生大多出生地主、富商家庭,他们回国后兴办实业,带动了醴陵工业的发展。

由“师日”到“抗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1895年到1915年,尽管只有短短的二十年,醴陵留日学生对日观念经历了巨大转折,即由“师日”到“抗日”。

在抗日战场,曾经留学日本的醴陵籍将领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李明灏、刘斐、张翼鹏以及国民革命军少将刘岳厚等。其中,程潜、李明灏、刘斐、张翼鹏均毕业于日本的军事院校。

在日本留学时,程潜结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到武昌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程潜赴云南参加护国战争,到湖南召集其旧部反袁,被推举为护国湘军总司令。1949年,程潜和醴陵同乡陈明仁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起义,让长沙城免于战火。

李明灏则一直不赞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李明灏给我党地下组织提供重要情报、文件和地图,并要求去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中央军委成都分校主任任觉伍准备密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00多人,李明灏还设法保护了这批革命力量。

醴陵北乡人王芑生则是当时外交界兴起的一颗“明星”。在日本留学时,王芑生就起草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1922年,日本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归还胶济铁路,其中的资料大多为王芑生收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芑生应蒋介石之命,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王芑生成为驰名中外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专家。

醴陵还有这些著名留日者

张汉英:1904年夏公费赴日本东京实践女校学习,后加入同盟会。回醴陵后,她首创女子学堂并兼任校长。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制订《临时约法》,张汉英提议将女子参政权载入,遭参议员中守旧人士反对。张汉英据理力争语惊四座,议案得以通过。她创办的《女权日报》,是湖南最早的妇女报纸。

杨卓林:曾东渡日本学习,后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杨卓林策划暗杀两江总督瑞方,事泄被捕。瑞方亲自审讯,杨卓林怒而掀翻案桌,慨然道: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林耶!1907年3月20日,杨卓林在南京英勇就义。

李发群:1906年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理化专科学校,后入同盟会,随杨卓林暗杀两江总督瑞方,结果失败被捕入狱。“二次革命”爆发后,李发群随黄兴至南京,任江苏省民政司长,后在张勋攻陷南京时遇害。

(记者 赵露)